

序 言

本书的主题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缀词‘后’。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切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变得习惯于后工业主义了,它对于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具有意义的。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而来的,是事情开始变得暧昧不清。有关后启蒙运动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至于一只猫都会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险涉足其间。它暗示了一种它无法命名的‘逾越’,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它暗示了它所命名的东西,同时否定了它与熟悉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过去’加上‘后’——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脱节的现实的基本处方。

本书是一种追踪词语‘后’的努力,这个词语‘后’有时被命名为‘晚期的’,有时被命名为‘超越的’。它不断地做出一种努力,即努力去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现代性的历史发展所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这种努力只有通过与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只是经由词语‘后’;它们的生命才得到了人为的延长——冲锋陷阵般的格斗才能获得成功。鉴于这些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不仅藏纳于其他人之中,而且残留于我自身之内,所以,与之作搏斗的噪音有时会回响于本书之中,这种噪音的响度部分地源自我也不得不与我本身所面对的对象进行格斗这个事实。因此,某些事情也许会显得刺耳,表现为极度的冷嘲热讽或鲁莽。通过习以为常的学术的平衡行为,人们是

无法抵抗来自陈旧思想方式的强大牵引力的。

在根本上，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不是沿着社会研究的经验路线进行的。倒不如说，它孜孜以求的是另一种抱负：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改变正开始成形的未来。以下内容写作于一种 19 世纪早期的观察者的心态之中，这个观察者注视着从衰退中的封建土地改革的外表后面涌现出来的尚未得到认识的工业时代的轮廓。在结构变迁期间，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与过去结盟，阻碍了我们对正从四面八方侵入地平线的未来山峰的观察。就此种意义而言，本书包含了一些立足于经验的、投射性的社会理论——而没有采取任何方法论上的防御措施。

此种做法基于这样一种评价之上，即我们是见证人——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发生于现代性内部的一种断裂的见证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这种情形需要对存在于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之间的矛盾做出一种细致的权衡，此种矛盾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之间、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的对抗状态中。这些划时代的区别如今正在显现出来这个事实，正是我想要在本书中加以表明的。它们在细节上是如何分化的则源自对社会发展迹象的观察。在获得清晰的景象之前，无论如何，一种稍远一些的未来必须进入视野之中。

我将涉及的理论上的骑墙态度，在实践上也有其对应者。那些在“当代非理性”的袭击面前空前紧密地依附于带有 19 世纪前提的启蒙运动的人，在每一点上都与另一些人一样受到了决定性的挑战，这些人试图把现代性规划连同其所附带的畸形产物冲刷得一干二净。

在这里，不必给自陷危境的文明令人恐怖的全景画再添加任何东西，这种景象在舆论市场的各个部分都业已被充分描绘。

这同样适用于一种‘新窘困’的各种表现,这种‘新窘困’已丧失了工业世界组织性的二分法,而工业世界甚至在它的各种对抗中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相继而起的第二步。它所做的是将这一步骤上升为解释的主题。问题是,如何以在社会学上受到启发和得到训练的思想来把握和概念化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既在意识形态上愤世嫉俗地进行否定,又有屈服于非批判性的危险。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引导性理论观念,能够再一次地以一种历史类比的方式来加以阐明。正如现代化消解了 19 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

无论如何,这种类比的局限有助于澄清论点。19 世纪,现代化在其对手的背景之上发生了:一个传统的道德观念世界,和一个要被认知和掌握的自然。今天,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在 19 世纪,等级制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遭了解神秘化。今天,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古典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之中,也发生在工作、闲暇、家庭和性的存在模式之中。处在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为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进行的现代化所代替,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和政治医书所没有提供的。正是这种展开于工业社会和现代性之间的对抗性,扭曲了我们进行‘社会测绘’的努力,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中来构思现代性。本书的论点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

这种存在于对传统的现代化和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存在于古典的现代化和反思性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我们的思想。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在对当代生活形形色色的领域的穿行中指向这一点。尚不清楚的是，工业社会精神的哪些支柱将在这种第二次理性化中崩塌。而这种第二次理性化在今天仅仅处于开端。但我们有良好的理由来对此加以猜度，即这种情形甚至将发生于一些最根本的支柱，例如，功能分化或与工厂相联系的大规模生产。

从这种陌生的视角中将出现两种后果。迄今为止，它仍保持为不可思议：在其纯粹的连续性中，按照完完全全的常态来说，工业社会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它是经由副作用的后楼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会理论的图画书所预测的方式退出的：通过某种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进而言之，这种视角意味着，如今正在颠覆着世界的反现代主义剧本——新的社会运动，对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批判——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驳斥，倒不如说是对于超出了工业社会轮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表达。^①

现代性的全球性影响与它的工业社会规划的局限和僵化形成了对立。通向这种观点的道路，为一种尚未破裂的、仍旧依稀可辨的神话所阻塞。19 世纪的社会思想本质上就受限于这种神话，而且它还给 20 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投下了一道阴影。这种神话断言，发达的工业社会，连同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的生产部门，它的立足经济增长的思想范畴，它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与它的民主模式，是一个彻底现代的社会，是现代性的顶

^①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近来获得了广泛的讨论，并为 A. 吉登斯(1990, 1991)和 S. 拉什(1992)所进一步发展。

峰——甚至设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神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有关历史之终结的疯狂笑话。这个观点对于这个时代拥有特殊的迷惑力,在这个时代中,创新正从传统的重压之下稳步地解放出来。或者,换言之,我们无法想像另一种正在到来的现代性,因为就我们的范畴所及,不存在这样一种现代性。工业社会或工业资本主义的古典理论家们,业已将他们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必然性,转化为隐蔽的先验性。为康德所激发的问题——什么使社会成为可能?——已经演变成一个一般而言有关资本主义的功能前提和现代性的必然性的问题。在社会研究领域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断言,即工业社会中基本的东西一直在变化——家庭、职业、工厂、阶级、工薪劳动、科学、技术——但同时,这些东西在原则上又没有变化,这种断言的古怪方式就是对于这一事实的进一步明证。一般而言,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地革命的社会。但在每一场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前所未有的紧迫之事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和理论,它们将允许我们构思以一种新方式贯穿着我们的新现代性,允许我们在它里面生活和行动。同时,我们必须与传统的财富保持良好关系,而不必以一种误解和悲伤的方式转向新现代性。无论如何,这种新现代性始终残存着陈旧之物。追踪早已伴随着陈旧事物的衰亡而开始出现的新范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追踪带有‘改变体系’的味道,会使得得到宪法保障的‘自然权利’陷入危险。另一些人已经避难于某些核心信念之中——这些信念可以采取许多形式: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量化方法、专门化——根据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忠诚观念,他们盲目地抨击任何散发出异端气味的东西。

然而,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并没有走向终结,至少不是因为在今天 19 世纪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甚至这样说也是一种夸大其辞。正如我们所知, 19 世纪的社会世界确实不是那么稳定的。它业已被摧毁过几次——在思想上。在这个领域,它在适时地诞生之前,就已经被埋葬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9 世纪晚期尼采的观点或‘古典的’(这就意味着陈旧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关婚姻和家庭戏剧的舞台作品,是如何在实际发生于 21 世纪开端时我们的厨房和卧室之内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在推迟了大约半个世纪或甚至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很久以前发生于思想中的事情正在如今的生活中发生。

我们也经验到——超出从前只在文学中加以想像的东西——人们必须在故事讲完之后继续生活。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一部易卜生的戏剧中经验到帷幕落下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经验到后资产阶级时代舞台之下的现实。或者说,关于文明的风险: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这种文化批判业已变得僵化,因而我们不再能够满意于文化批判的诊断,这种诊断总是更多地意味着某种告诫性的悲观主义。如果‘超出’没有如实地得到认识并被摆脱,那么整个时代就不可能进入某个超出从前所定义的范畴的空间。人为地延长了过去对于权威性的要求,这个过去已经洞察到了逃出它手掌之外的现在和未来。

因此,这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主导性的观念从两个角度发展而来。首先,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相互掺杂将用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来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第一篇)。在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之中,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

产的阴影所笼罩。在早期阶段,这些还能被合法化为‘潜在的副作用’。当它们日益全球化,并成为公众批判和科学审查的主题时,可以说,它们就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中走了出来,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核心的重要性。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它至今决定着社会一理论(的思考)而发展起来。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不像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第一章和第二章)。

然而,这些‘社会危险’与它们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潜力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方面。当人们把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就显现出来(第二篇和第三篇)。一方面,在昨日、今日和整个未来永存的阶级或阶层化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筹划为一个扩展的群体社会。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的有效性,而在战后的发展中,这种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正处于不断丧失传统特性的过程之中(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核心家庭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变成了常规的和标准化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核心家庭奠基于男人和女人被硬性划定的和(不妨说)封建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开始与持续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将女性投入于工作过程中,日益频繁的离婚,等等)进行搏斗。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开始改变,正如与工业社会‘核心家庭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样 婚姻、亲子关系、性、爱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根据(工业)工作社会而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当前的理性化却直接将目标对准了工业社会的有序模式: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线。微电子技术带来了一种跨越生产各部分的部门、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新的网络化。但随之而来的是,早先的就业体系的法律前提和社会前提被‘现代化掉了’大规模失业被整合进以一种崭新的多元化不充分就业形式出现的职业体系,伴随而来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危险和机会(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包括方法上的怀疑论)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论(首先)局限于外在的研究对象,而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却在内部风起云涌的怀疑论面前被保护得严严实实。怀疑论的区分对于专业化的目标是必要的,正如它在易错论的猜疑面前是不稳定的一样。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在它的内在和外在关系方面都经历了非连续性。在这里,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怀疑论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危险之中,因此,科学既被普遍化了,也被解神秘化了(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要求和形式伴随着工业社会而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这些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受到了削减。被制度化为‘进步’的亚政治的创新依然处于商业、科学和技术的管辖范围之内,对它们而言,民主程序是虚弱无效的。在反思性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这种情形变得成问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或危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从政治手中接过了塑造社会的领导性角色(第八章)。

换言之:一种内在于工业主义中的传统性的组成部分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铭刻在工业社会的建筑物上——铭刻在“阶

级‘核心家庭’、专业工作’的模式之上,或铭刻在对‘科学’、‘进步’、民主’的理解之中——同时,它们的基础开始在现代化的反思性中瓦解和粉碎。听起来也许令人奇怪,为这种情形所激发的时代愤怒,并非现代化危机的产物,而是现代化成功的产物。甚至针对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反思性现代化不是意味着更少而是意味着更多的现代性,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构架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

我们正在经验一种变化之基础的变迁。不过,为了构想这些假设,工业社会的形象必须修正。就其蓝图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它内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陈旧的或传统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工业时代自身的结构和产物。工业社会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论——和其制度的特殊结构之间,在其制度中,这些原理只能在一种部分的、部门的和有选择的基础之上得到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业社会通过其体制而使自身变得不稳定。连续性成为了非连续性的“原因”。人们从工业时代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来——正如他们在宗教改革期间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社会一样。由此所产生的震动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把生活和思考紧紧地系缚于工业现代性之上的坐标体系——性别之轴、家庭之轴和职业之轴,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开始动摇,同时机会和危险的新的黎明正在形成之中——这就是风险社会的轮廓。这是机会吗?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了作者的发现和学习的过程。在每一章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部分变得更聪明一些。存在着一种从

结论出发重写和重新构思本书的巨大诱惑。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乏时间。如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新的过渡阶段还会再次出现。这再一次强调了本书论点的过程性特征，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对缺陷的空白检查。对读者来说，它提供了单独地或以不同的秩序阅读各章的好处，并促使他们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反对和增补这些论点而进行彻底的思考。

或许每个接近我的人都业已在某些地方遭遇了有关本书主题的卷帙浩繁的已有文献，以及我对于他们的评论的请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完全满意于不断浮现的变化。一切都渗透于其中了。这种在我的研究活动领域中主要与年轻学者的合作，在这个文本中或在此处的序言中都无法被充分地谈及。对我而言，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激动人心的体验。这个文本中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是对于个人谈话和共享生活的“剽窃”。虽然只能挂一漏万，但我还想致以谢忱 感谢 E. 贝克-格恩斯海姆，为了我们每天所度过的非凡生活，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思想，为了我们相互之间从不缺乏的尊重；感谢 M. 雷里希，为了诸多的思想、谈话和复杂的材料准备 感谢 R. 许茨，为了她的神圣而富有感染力的哲学好奇心和鼓舞人心的想像；感谢 W. 邦斯，为了几乎涉及本书所有部分的成功而富于探索性的谈话；感谢 P. 贝尔格，为了他向我提供的一份大有帮助的反对意见；感谢 C. 劳，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对某些固执己见的论点的支持；感谢 H. 施托姆普夫和 P. 索普，为了他们的诸多启示，为了他们富于创造性地提供的文献和经验材料；感谢 A. 沙赫特和 G. 穆勒，为了他们在打印文本时的可靠与热情。

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同事们的令人愉快的鼓励，它们分别源自 K. M. 博尔特、H. 哈特曼和 L. 罗森迈尔。重复和错误的形象总会存在，因此我有意识地要保留瑕疵的痕迹。

任何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仿佛看见了湖泊之闪光的人都没有出错。本书的主要部分写作于山顶空地，这座山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阳光、微风或波浪的评注直接被纳入书中。这个非同寻常的工作场所——受惠于阳光灿烂的天空——由热情好客的弗劳·鲁多尔菲女士和她的家庭所提供。他们甚至禁止他们的孩子在靠近我的地方玩耍，禁止他们的家畜在靠近我的地方吃草。

一份来自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学术津贴为这段闲暇时间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它，也许这项学术事业就无法进行。为了我的方便，我在巴姆贝格大学的同事 P. 格罗斯和 L. 瓦斯科维奇同意推迟他们的休假学期。我真诚地感谢所有这些朋友——他们对我的错误和夸大其辞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也许还要感谢那些没有打扰我的安宁并忍耐了我的沉默的人。

（陆月宏译）

第一部分

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风险社会概观

第一章

论财富分配的逻辑 和风险分配的逻辑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

这种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的转变，在历史上(至少)与两种情况有关。首先，就像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转变发生在——并且是在此程度上——那些纯粹的物质需要上面，它们通过人力的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法律和福利国家的保护和规范，能够在客观上被降低，并且在社会中被隔离。其次，这种范畴的转变同样依赖于以下事实：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①

^①现代化意味着组织和工作中的技术理性和变化的狂潮，但除此之外，它包含了更多的东西：社会特征和标准生涯的变化，生活方式和爱的模式的变化，权势结构的变化，政治压制和参与形式的变化，对现实的看法以及知识模式的变化。在社会科学对现代性的认识中，耕犁、蒸汽机车和微芯片是一个更为深层的、构成和重塑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进程的可见指示物。最后，生活所依赖的确定性源泉变化了（Etzioni, 1968; Koselleck, 1977; Lepsius, 1977; Eisenstadt, 1979）。最近几年（本书德文第3版出版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潮流。现在，争论的中心是用后现代的观点质疑现代化的可能性（Berger, 1986; Bauman, 1989; Alexander and Sztomпка, 1990）。

随着这些情况的发生，一种思考和行动的历史模式就被另外一种模式相对化或超越了（在马克思或韦伯最宽泛的意义上）‘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这样的概念，是围绕着社会生产的财富是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它与新的风险社会的范式相重叠，后者要解决的是与前者相类似然而又是极为不同的问题。在发达的现代性中系统地产生的风险和威胁，如何能够避免、减弱、改造或者疏导？最后，它们在什么地方以一种“延迟的副作用”的形式闪亮登场？如何限制和疏导它们，使它们在生态上、医学上、心理上和社会上既不妨害现代化进程，又不超出“可以容忍的”界限？

从而，我们不再仅仅关心利用自然或者将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的问题，而是也要并主要地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产生的问题。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在自然、社会和个体领域中的）科技发展和使用的问题，被对实际或可能使用的科技的风险进行政治和经济“管理”——依据特别界定的有关它们之重要性的观点去发掘、治理、认识、避免或掩盖这些危险——这样的问题所遮盖。对安全性的承诺随着风险和破坏的增长而增长，并且这种承诺必须对警觉和批判性的公众通过表面的或实质的对技术—经济发展的介入而不断地重申。

两种有关不平等的“范式”都系统地与现代化的特定阶段相联系。只要在国家和社会中明确的物质需要——“短缺的专制”——还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像今天在大部分所谓的第三世界中那样），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突就占据着历史的前台。在这种短缺社会的境况下，现代化进程是随着用科技发展的钥匙开启隐藏的社会财富源泉之门的主张

而开始的。从阶级到阶层化和个体化的社会中，这些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赖中解放出来的承诺，都是以社会不平等范畴进行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

在西方高度发达的、富裕的福利国家中，正在发生一种双重过程。一方面，为了“每天的面包”的斗争，与在 20 世纪前半叶以及被饥饿折磨的第三世界人们相比，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个超越于其他一切问题之上的首要问题的紧迫性。对很多人来说，“超重”的问题代替了饥饿的问题。虽然这种发展状况撤消了现代化进程的合法基础——对明确的物质短缺的斗争——但我们还要准备接受它的一些（不再是完全）看不见的副作用。

与此相应的，是有关财富的源泉已经被不断增长的“有害副作用”所“玷污”的知识在扩散着。这绝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它在力图征服贫困的努力中被长时间地忽略了。这一阴暗面同样通过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而获得了它的重要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像力也为之不知所措。这两方面都助长了一种逐渐增加的对现代化的批判，它突出地但又是有争议地决定着公众的讨论。

系统而言，从社会演化史的角度来看，或早或晚，在现代化的连续进程中，“财富一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会开始和“风险一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在联邦德国，我们最迟在 70 年代早期已经在面对这种转变的开始——这正是我的论点。这意味着两种类型的主题和冲突在这里是重叠的。我们还没有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但我们也不是仅仅生活在短缺社会的分配冲突中。只要这一转变发生，就会出现一种实质的社会变迁，它将使我们远离原先的思考和行动模式。

风险社会的概念能够表达它被要求表达的理论和历史意义吗？它涉及的不是一种人类行为的古老现象吗？难道风险不已